

04663

档案学术论文写作辅导

(内部业务学习材料)

下 册



西安市档案干部业务职称评定委员会 印
西 安 市 档 案 学 会

目 录 (下册)

第五部分 档案学术论文选

- 一、档案的学术利用……………(英) 迈克尔·罗珀 (275)
- 二、现代史与档案……………(瑞典) 林德勃夫 (295)
- 三、城市发展与档案……………(匈) E·哈拉契 (304)
- 四、档案与普通公民……………(意) L·普林西普 (312)
- 五、档案的普遍利用……………(法) 克莱尔·贝尔舍 (327)
- 六、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
档案事业……………普里、张中 (345)
- 七、我国社会主义档案工作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张 中 (351)
- 八、三十年来我国档案
研究及今后发展……………吴宝康 (362)
- 九、怎样解决档案利用工作中的
供求矛盾……………王明哲 (442)
- 十、关于档案数量及其与
鉴定工作的关系……………陈兆祺 (455)
- 十一、谈谈档案虫害的预防……………冯乐耘 (465)
- 十二、对科技档案管理学几个问题
的初步认识……………沈永年 (483)
- 十三、论科技档案与经济效益……………王传宇 (508)

十四、坚持用辩证法观点

指导档案工作……………和宝荣 (524)

十五、对档案史料编纂工作

若干问题探讨……………朱金甫 (547)

十六、试论档案与历史研究的

相互关系……………黄武 (570)

十七、关于文书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松世勤 (585)

十八、论档案馆工作的文化学术性……………李国庆 (610)

十九、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杰出的

档案学家……………李学彬 (625)

二十、书教上……………章学诚 (652)

第五部分：档案学术论文选

档案的学术利用

〔英〕迈克尔·罗珀

学术史的发展

自从1950年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大会在巴黎举行以来，高等教育出现了世界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发展，其特点之一就是学术研究在历史及有关学科方面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英国从事学术史研究的人数，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研究生，从1961年到1976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根据《历史概览》的记载，在这个相同的时期内历史专题论文和报刊文章的数量增加了两倍。虽然有迹象说明，这种增长情况在西欧和北美目前可能已达到顶点，或者至少其增长速度要慢得多，但看来在其他地方还会出现高峰。而不得不与学术史发展的整个情况发生关系的档案工作者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那些尚未经历过的人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

随着进行学术史研究的人数的增加，研究学术史的兴趣更广泛了。除了历史研究的三个传统部门，即政治（立宪）史、法律史和教会史之外，又增加了军事史（不再是退役军人的专有领地），国际中和经济中，而从它们中间产生的社会史

最近又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虽然从事历史研究的三个传统部门的研究人数从绝对数字来讲并未下降，但在从事整个学术史研究的人数中，他们所占的比例则肯定地下降了，并且还在继续下降。由于研究兴趣向新的历史部门转移，对二十世纪史的研究在不成比例地飞速发展着，而且在“当代史”的名义下这种研究几乎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部门。

此外，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历史部门，特别是经济史和社会史，都已经发展了许多分科，如商业史、劳工史、农业史、运输史等。每个分科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围、各自的方法学和专门的刊物。此外，日益增加的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员又在专攻他们学科的历史，因而产生了历史地理学家、教育史家、科学技术和医药史家、思想史家、艺术史家等。而且还有其它人员正在利用史料来扩大研究他们具体学科的新范围。因此，研究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后时期的考古学家，特别是海洋和工业考古学家，正在利用史料帮助他们鉴定具有潜在意义的遗址，并对其进行解释和修复；而语言学家正在从使用文学资料转而使用一向只作为人名和地名研究而使用的史料，以更好地了解语言和方言的发展。还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况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应用史研究”，而这种研究一向被看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调查而进行的对过去的探险”。历史资料在这类研究中被用来对普遍应用的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历史的新方法

非历史学家参加历史资料研究，使史学和其他学科因相互补充而受益。其结果之一是史学家采用了一些学科所使用的技巧，特别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技巧，并对其进行革

新，发展了研究历史的新方法。新的技巧和方法并不是任何一种学科或历史时期的专有品，而且也不一定是新的东西，至少从下列这些方面来说是如此：要组成社会各个方面的广阔画面，就要收集大量的、涉及广泛来源和包括很长历史时期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每一件本身可能不很重要。“编年史”学派（该派因出版刊物《编年史、经济、社会与文明》而得名。路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克的法国门徒常常在该刊上发表文章）的成员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布劳黛尔教授对十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超越国家范围的、题材广泛的研究报告，早在1947年就第一次发表了。在这篇报告中，他把气候、地理、经济和社会资料进行综合，提出了新的理解和看法。这种研究方法在最近几年里则更普遍采用，并产生了象历史人口统计学这样的专门学科。这门学科利用人口中每个成员的生存资料（出生、洗礼、婚姻、死亡、丧葬等记载）产生有关生育率、平均寿命、结婚年龄、私生子比率等问题的综合资料。还有象对上流阶层研究的学科，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详细的传统性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引用对比的方法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机构进行解释。这种方法通常称为“纳米埃方法”，是战前另一位先驱者路易·纳米埃爵士首创的。这种方法被用来研究象十八世纪英国下院和法国殖民当局等这种情况各不相同的机构。因此我们这样说也许是公正的，即“新的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来自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采用越来越精密的统计方法，并且往往借助于电子计算机对大量过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因而称为“定量史”）。史学家采用的另外一些新方法包括：心理分析

术，用以编写个人或团体的心理史；社会学采访术，使用手提式磁带录音机，这导致了“口述史”的发展。这些新方法和新技术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在新的历史学派中对这个问题也存在着分歧。档案工作者对史学家的争吵不能起偏袒任何一方的作用，但是要不偏不倚地和有效地满足史学家的需要，就必须对史学界的新趋向有所认识。

学术史和档案

随着从事历史和有关学科研究的学者人数和研究兴趣的增加，对档案材料的依赖也就越来越深。虽然产生和保存国家的、机关的、或私人的档案的首要目的，始终是为了政府和法律上继续的需要。但是为了历史研究而利用档案材料，比现代化正式档案机构的建立往往要早得多。因此法国的摩尔学派、比利时的波兰德学派，以及英国的威廉达格代尔爵士和他的追随者在十七世纪研究原始档案的时间，比这些国家中建立的任何国家档案馆的时间要早得多。然而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在兰克的影响下，利用档案以代替编年史和其他文学史料，以及对全部有关史料的性质与可靠性所进行的透彻的研究，成为现代历史方法论的基础，并促使历史学家经常前往档案馆。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过去的十多年中，利用档案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数增加了许多倍，而且总的说来远远超过了为政府管理、法律、商业和其他纯实用目的而查找档案的利用人数，虽然在有些档案馆内这些人数与家谱学者、业余史学家的数目相等。在这次档案大会的其他几次会上将要讨论档案的实际利用和普遍利用等问题，本文将不予论述。但有一点要说明，所有这三种利用方式都可能出现

对档案材料的争夺。因此有必要提请注意，不要因为档案管理的系统化和档案工作的普及而忽视在档案工作中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

档案的学术利用不仅在近年来有所增加，而且还扩大到更广泛的档案材料方面。因为虽然在政治、法律和宗教方面利用档案材料的人数也在增加，但目前他们与学术利用人数相比，却在日益减少，特别是已被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利用人数所超过。同时，比例越来越大的各种学术利用者把他们查阅档案的兴趣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转向十九世纪，而且越来越转向二十世纪。档案学术利用人数的增加与范围的扩大，对于档案工作者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来说，有着许多的含义。其中有些含义是数量和物质方面的，如满足阅览室设备和文件借阅系统不断增长的需求；另一些则是质量和知识方面的，如设计有关出版物的方案和建立一些反映利用者广泛兴趣的鉴定准则；也包括对档案工作者培训和对档案史料一般性确定等方面的含义。

日益增长的档案学术利用的物质含义

利用档案人数的任何增长都会给阅览室设备和文件借阅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日益增长的学术利用即使不是增加这种压力的唯一因素，联合王国公共档案馆的经验说明，学术利用起着特别大的作用，因为学术利用者去档案馆的次数更多，而且每次查阅的案卷要比非学术利用者查阅的多。英国公共档案馆在1962年到1972年期间利用档案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半，从而造成了过分拥挤和排队的现象。缓和这种现象的办法先是将存放档案的库房改辟为阅览室，接着是接收附近的

大楼的一些设备,最后是建筑一幢新的档案大楼。在同一时期内,库房向阅览室提供查阅的文件数量也增加了两倍左右。造成这种不成比例地增长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尤其是社会史和经济史)感兴趣的人对档案的利用。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由于政府管理机构的扩大和复杂化,同时实行了现代化的按主题立卷的方法,档案保管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而既成倍地增加了潜在的资料数量,同时也限制了每一件资料的范围,因而能够以合理的速度进行工作。所以,现代史学家在一个工作日里能查阅各个不同机构的十几套案卷,而从事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史研究的史学家在查阅一个案卷或一本登记簿时,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社会史家和经济史家对大量资料的兴趣,特别是在查阅与某些具体项目有关的、可用作定量分析的资料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了对利用者提供档案的比率。例如,在1978年1月到9月间,一位助理研究员在英国丘园公共档案馆查阅6,418件十九世纪的案卷,以寻找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要对这种研究项目进行专门的安排,以免影响对短期利用数字的统计。但是库房向阅览室提供查阅文件的普遍增加则是有明显的含义。如果在几年内查阅文件的数量增加很多,那么就应按比例地增加借阅文件的工作人员数量,或提高文件借阅系统的效率。把最经常利用的档案放在靠近阅览室最近的地方,会大大有助于效率的提高,但这涉及到建立一套精密的监督制度和按不同需要经常搬动档案的问题,而且这种做法的效果是有限的。随着利用档案的继续增加,需要建立机械化的处理设施及其他的现代技术工具(如自动运送机、风动管、电子计算机等),而这些反过来又涉及到结构上的改

革或建设新的存放档案的设施。

大量利用受读者欢迎的专题类案卷，特别是那些纸质较差的现代文件，很容易因为过多的搬动而受破损，因此要求对它们进行经常性的保存方面的处理。如有可能，最好在移交给档案馆前检查清楚，并在向公众提供阅览之前进行处理。但由于档案数量多和文件性质的不同，利用传统的手工修复法花钱多，花费时间长，因而需要寻找更快、更便宜的修复方法，而最合适的是薄膜压层法。另一种花钱少、时间快而且同样有效的代替办法是保存复制件，即用照相复制件代替原稿向阅览室提供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英国公共档案馆已把十九世纪的人口普查案卷拍摄成缩微胶卷，其他档案馆也对非常有价值的、经常利用的易脆案卷进行缩微复制。一种代替照相复制的办法是用纸张翻印缩微胶卷，并以古抄本的形式装订成册。英国公共档案馆对二十世纪内阁议事录就是采用这种做法。对这两种方法进行选择时应考虑到各种因素：翻印缩微胶卷和纸张装订所花费的时间与原料同拍摄缩微胶卷的成本和缩微胶卷阅读机的投资费用相比较的问题，纸张印刷品与缩微胶卷在相对耐久性方面的比较，以及缩微胶卷阅读机安装在阅览室因占用一定的空间而使阅览室失去某些灵活性的问题等。出借缩微胶卷或照相复制件来代替出借薄膜压层修复的原稿文件的一个好处是，可很容易地复制出更多的副本来代替受损坏的复制件，而且使失窃也成了一种不是了不起的灾祸。因此提供这类档案材料，可在“开架”或自取的基础上进行，从而满足了利用者的需要，而不会对提供文件借阅的工作人员造成压力。此外，它对安全的要求、搬运中所要采取的防范措施等，也不象对档案原

件那样严格了。

现代照相复制技术的发展对档案的学术利用者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远离档案馆的学者，其需要一向依靠出版主要文件专题集副本和摘录来满足，而且目前仍在使用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研究的趋势是从集中管理的主要专题类文件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史学家特别需要的、较为分散的次要文件中所包含的那些资料，加上主要的专题类文件越来越多，因此传统的档案出版物对大多数进行学术史研究的人来说，其使用价值已不那么大了，目前已逐渐被照相复制所代替。这种照相复制包括从对单份文件的静电复制到对整个专题类文件或其他的一系列性文件进行缩微复制（包括缩微胶卷和缩微平片）。档案缩微复制件可作为正式出版计划的一部分对外提供。它可以象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样由档案馆自己进行，也可以象英国的公共档案馆那样由特许的商业出版社来进行。在加拿大、美国和苏联等那些主要人口中心彼此相距很远的国家里，位于首都的国家档案馆可把主要的专题类文件的缩微复制件分别存放在全国各地的分馆或地方档案馆内，甚至可通过图书馆间（或档案馆间）的借出系统更普遍地向利用者提供。但是照相副本（不论是缩微胶卷还是静电复制件）的主要好处在于可针对具体的利用者，就是说，个别的大学研究机构或学者可选择有关的专题类文件，甚至单份文件，并可以有限制地购买这些文件的复制件。利用者由于有更多的选择方面的灵活性而可能要花费更多的钱，但他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愿意要和他们自己的需要无多大关系的正式缩微出版物。另外，为一个档案分馆、大学，甚至一名学者拍摄一套档案材料有助于减轻阅览室和档案借阅部门的压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复制个

别文件时可能出现这样的阶段：花在查找、借阅和复制等工作人员上的费用比花在便于文件本身查阅方面的费用更多，因此在制订档案的价格政策时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另外，档案在复制过程中的搬运（特别是在摘录文件中对装订很严实的或易碎裂的档案的搬运）带来了文件的保存问题。许多档案馆对一些档案的复制过程作了某些限制。

静电和其他“快速”复印系统同时给档案馆内工作的学术研究人员在工作方法上带来了革命：他们不必费劲地去抄写和摘录与他们研究有关的文件了；他们所需做的，是找出与他们有关的文件，然后购买这些文件的复制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少花点时间在阅览室内，从而减轻了使用阅览室的压力，或是能在他掌握的时间内看更多的文件而更有效地利用时间。但这样做却增加了文件借阅部门的压力。

增加档案学术利用知识的含义

对大多数利用现代文件的学术人员来说，已广泛使用缩微胶卷和“快速”复制件，而不再使用手抄件和文件摘录等传统出版物，因此档案出版物的作用已变成档案馆向潜在的利用者提供档案服务工作的一个因素。由于广泛使用缩微胶卷和“快速”复制件，利用者在档案馆内进行查阅很便利，从而加快了他们的研究工作，或者是利用者通过订购缩微胶卷或其他复制件的办法而不需再去档案馆。对档案越来越多和越广泛的利用给档案馆的档案服务工作增加了负担。利用人数的绝对增加，意味着档案工作者照顾每个利用者的时间越来越少，而档案数量的日益增加和日趋复杂，使没有经验的利用者感到越来越困难。让利用者，特别是新手完全依靠他本人的

知识是不可取的，而如果利用一些专家的力量把档案工作者的知识编成文字性的小册子，供利用者参考或帮助他们自学则更为经济实惠。利用者进行研究中最需要的工具是查找指南，一般有四种：指引有关档案机构的指南；了解档案馆内文件的有关全宗、类别、专题、汇集等分类情况的指南；提供单份文件专门参考资料的指南；帮助了解文件内容的指南。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对各类档案馆中档案的处理也不一样。在有全国统一的档案服务设施的国家内，相对来说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内，利用者首先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弄清楚他所要的档案的保存处所：是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地方政府档案馆，还是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大学图书馆手稿部，或是在其他档案馆，甚至私人手中。因此利用者所需要的第一种查找工具，就是有关一个国家全部档案的统一登记本。而这类登记本可以象加拿大、美国和苏联那样印刷成册的统一目录；或者象英国公共档案馆和爱丁堡公共档案馆的登记本那样，把单份指南和目录编成统一保存的索引集。其他许多国家目前正在考虑建立这种集中的档案登记本。这种登记本往往属于包括图书馆和文件中心收藏资料在内的、范围更广的情报资料网的一个组成部分，简称为“纳蒂斯”，即全国情报资料系统。

全国档案登记本可以由专门地区的、超越一个国家或一个机构的史料指南来补充，例如国际档案理事会发起编写的《各国史料指南》，或有关专门主题（如航行、保险等文件）的史料指南。这种主题指南在帮助学者查找有关资料方面常常起着启蒙的作用。但这种指南比较简略，如要直接查找所需的各个文件，就得使用档案馆内更详细的查找工具。

大多数新到档案馆的利用者,特别是非历史学家,在政府管理变得更为复杂和扩大到新的活动领域的情况下,对按文件产生机构而不是按文件主题整理档案感到难于掌握。机构过于频繁的建立、分开、合并、取消等等,造成了文件管理方面的混乱,例如澳大利亚档案馆中27%的专题类文件不是由一个机构产生的。由于研究政府管理活动的历史学家对二十世纪的政府管理活动的研究以很慢的速度从表面走向深入,档案工作者有必要成为政府管理史专家,以便向利用者解释他所保存的档案中文件的政府管理方面的背景和整理这类案卷的情况。原来主要依靠档案馆的综合指南满足这一要求,但由于新增加的档案越来越多,这种指南已很难满足新的要求。有些档案馆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已把它们的指南进行计算机处理,以便象美国国家档案馆那样进行出版,或象英国公共档案馆的“帕洛斯贝克”(PROSPEC)系统那样放在阅览室供对外利用。

综合指南内容进一步的扩充就是“手册”或特别指南,这是与某个特别机构或某些机构的案卷有关的指南,比综合指南更详细地叙述一个机构的管理史、有关主题的工作法、文件的保管制度和文件的整理情况等等;它也可能是有关从整个范围到档案馆馆藏的、某一具体主题的案卷指南。英国公共档案馆出版的“手册”丛书中刊登了这两种类型的指南,法国和美国也编写了第二种类型的指南。

利用者从综合指南和其他特别指南中找到了同他的查询题目有关的全宗、分类、专题、汇集等之后,下一步就是查找与他利用有关的条目。满足这种需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利用者提供更具体的查找工具,如目录表、索引等。这种

查找工具越详细，利用者的研究就更有目的性，从而节省利用者的时间，减少对阅览室和文件借阅部门的压力。目录至少要包括标题和每个文件的产生日期。如有记述各个文件的详细目录和索引当然对利用者更有好处。但对于新档案馆来说，由于刚开始接收未经编目的文件和大部分未经整理的文件，要求做到那样的完善和细致，也许是一种无理的苛求。即使在那些设备完善的档案馆内，人们也会感到过去不太忙的时期内用于文件接收、分类和编目等的程序和资源，无法赶上如潮水一样涌入档案馆的现代案卷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较好的办法是，对每类、每个专题或每个汇集都编写查找工具，不管这种查找工具多么简短、不详细和带有临时应急性，也比那种只有“重要的”类、专题或汇集才有详细目录或联合索引（一年比一年更落后于时代）的做法要好一些。从长远来看，档案工作者可期望电子计算机协助提供更多更好的查找工具。但是在这方面使用过计算机的人普遍认为：编制输入计算机的数据是一个耗费时间的过程，而且只有在几种不同的程序中输出数据或者新旧数据融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效益。

在正式出版查找工具成为一种既定传统的地方，如果这种出版工作用去了本来可用来出版尚未编目案卷的查找工具的资金，则最好要考虑这种出版工作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的问题。虽然看起来这是为了档案馆内利用者的利益而忽视了远离档案馆的利用者；但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因为现代复制技术有可能向远离档案馆的利用者提供与利用者特别有关的查找工具。的确，许多进行出版查找工具工作的档案馆目前都在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传统的出版工作花钱太多。

利用者即使已找到与他研究有关的文件，可能仍需要档案工作者进一步的帮助，以确定文件中所包含的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情报资料：文件产生的机构和产生的目的，在文件产生机构的内外运转情况，文件的通常形式和特殊形式等。研究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史的历史学家习惯于提一些与他们所研究的文件有关的问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能得到有关古文书学的一些正式的指导。但对最新文件的文书处理研究，如保存文件的制度（包括登记、分类、起草、批准、分发），对文件集中过程的组织（包括记录、登记、卷宗、案卷夹等）和零星文件的通常形式（包括信件、记录、备忘录、表格）等，注意得不够。对现代文书学不得不进行深度研究的，往往就是档案工作者。他们负责文件的挑选工作，以便对文件进行整理、保存及查找工具的编目工作。档案工作者的知识应该通过指南、手册、查找工具以及对档案馆的实际接触而向利用者广泛地介绍，还应利用其他各种机会介绍他们所保存的档案情况。这包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他们的文章，或参加历史和其他的讨论会或会议，特别是与档案内容和组成情况有关的讨论会或会议。最后，更多的档案馆应象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那样，组织由档案工作者、史学家、档案的其他利用者及今后可能的利用者一起参加的会议，来交流经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出版会议记录等，以便使公众对档案馆有更广泛的了解。从低一级的范围来讲，档案工作者可参加对新的学术利用者进行研究生培训的工作。在一些历史研究生院已进行这项工作，其方法是邀请档案工作者参加讲课和讨论会。但值得考虑的是，是否应该由档案馆本身来为新的学术利用者举办正式的入门训练班。

变化中的学术利用和对文件的鉴定

学术利用者对档案兴趣的不断变化和日益广泛，意味着档案工作者在确定文件鉴定准则时，眼光必须放得开阔一些。现在我们如果把制订选择永久保存文件的指导原则一般说成是“可能有作为先例而具有保存价值或具有历史的、法律的重要性”，那已经不合适了。这本来是战前（1939～1945年）英国公共档案馆的细则中引用的一句话。即使象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细则中所论述的那样，加上“或对社会、经济研究有益”这句话也不适合了。现在的鉴定准则应该范围更广泛，内容更明确。例如英国公共档案馆目前把应保存的文件定为十三大类。此外，还有与各个具体政府部门或其他移交机构的文件有关的更加详细的准则。的确，由于在文件鉴定中要考虑的问题范围很广，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应很好地听取专家的意见。如何听取这些意见，各档案馆之间的情况各不相同。一种极端是，有一个章程规定，即由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组成一个咨询机构，以参加文件鉴定的全过程。另一种极端是，无正式的规定，即在必要时询问专家的意见。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则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个人意见。

最近几年来，在一个具体的领域内，文件鉴定的重点发生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即“案例”或“特别案例”文件问题，被称为“特大文件全宗，每个全宗虽然涉及各种不同的人物、机构或地点，但都是相同的主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解决这一大批文件的一个办法是“……只保存作为一种统计样本的那些文件”，而不再保存那些“仅有家谱或传记方面利用价值的文件”。但是从五十年代以来，定量技术